



文化危机与 展望

—— 台港学者
论中国文化

下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丛书

文化危机与展望

——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

下

刘志琴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孙晓红

文化危机与展望
——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
刘志琴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8印张 2插页 419千字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9.85元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龚书铎	刘志琴
编 委：	刘家和	刘志琴
	张 琢	何兆武
	郑一奇	董乃斌
	龚书铎	

目 录

文崇一

中国传统价值的稳定与变迁 (1)

韦政通

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 (21) 文化冲突与生活失调
(56)

傅伟勋

儒家思想的时代课题及其解决线索 (83) 中国大陆讲
学三周 (83) 后记 (115)

殷海光

道德的重建 (150)

林毓生

中国人文的重建 (190) 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
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230)

何秀煌

世界文化·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再建问题
——一个方法论上的考察 (277)

刘述先

当代新儒家的探索 (299)

水秉和

儒家模型及其现代意义 (324)

余英时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338)

杜维明

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 (391)

成中英

生活素质的哲学分析——论生活质素的要素及其评价
(434)

黄俊杰

从中国文化史立场试论当前文化建设之意义及其方向
(481)

附 录

钱 穆

如何研究文化史 (496)

座谈会

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的现代化 (507)

文崇一 (1925—)

江西宜春人。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著有《楚文化研究》、《西河的社会变迁》等。

中国传统价值的稳定与变迁*

西方学者在批评传统中国社会时，常常喜欢用静态的或向后退的一类字眼来形容它缺乏创造力和生气。这显然不是讨论社会文化发展的合理方式。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任何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稳定或变迁都是相对的。就是说，在一个长时期里，文化或社会既不可能完全稳定下来不变，也不一定能变得完全失去本来的面目。许多学者采用动的 (dynamic) 或均衡的 (equilibrium) 观念来讨论它，就是基于这种原因。

本文只是想用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因素——价值体系来探讨它的变或不变。

• 本文英文摘要曾在1971年第28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中宣读。此处中文稿已修订过 (1973)。

中国的传统价值牵涉甚广，无法在一篇短文里完全介绍清楚，这里只提出若干要点来讨论。不过，从这个大纲中还是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价值变迁的迹象与趋势。

中国传统价值体系 (Value-System) 很复杂，这里只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1. 认知价值：如尊重儒家传统的宇宙观与权威态度；
2. 经济价值：如重农，重视家族资产；
3. 政治价值：如尊重专制政治，追求权力；
4. 社会价值：如重视家族与官绅的地位；
5. 宗教价值：如敬天、祭祖、祀鬼神；
6. 道德价值：如强调四维八德，君臣父子关系；
7. 成就价值：如追求功名，重视立德，立功，立言。

在价值体系中有个人、集体与社会三种取向。个人的偏向于动机取向^②，集体的偏向于集体自我取向，社会的偏向于价值取向。不管那一类，都具有指引行为的作用^③。所以价值的另一面，也许就是社会规范 (social norms)。在我们，可以叫做“礼”，礼是用来节制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工具。价值和规范因而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许多为大众所接受的价值取向 (value orientation) 也往往从社会规范上表达出来。其次，价值本身不能当作一种实体的存在，仅是表现人类的某些欲望，动机，意向，兴趣，目的，或个人与群众行为的方向。基于一些同样的价值取向使复杂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成为可以了解，并且成为沟通个人或群体间的桥梁。第三，任何价值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牵连。一种社会的价值有时又是经济的，政治的，或道德的。以家族为例，就牵涉到这许多方面，甚至与认知的和宗教的价值也有关系。分类只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只是一种理想形态 (ideal type)。本文上述的分类是根据 Spranger 和 Firth 的分类法^④加以

修改而成，我觉得这种形式比较适合于讨论中国的传统价值。

价值也是文化的产物，经由文化变迁理论的途径，我们可以了解价值变迁的趋向。在社会文化变迁中争论最大的是，技术先于意识形态而变，抑意识形态先于技术而变？价值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即是，技术最先变革，还是价值影响技术变革？有些人，如Karl Marx赞成前者；又有些人，如Max Weber赞成后者；也有人认为两者难分先后，有时是价值推动技术变迁，有时又是技术推动价值变迁^⑤。从目前许多开发中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倾向来看，价值与非价值间似乎没有必然的优先变革次序；在变迁中，它们只是一种互动关系^⑥；在变迁中，它们必须互相调适。如果新价值与旧技术，或新技术与旧价值，彼此不能调适而产生冲突，就可能导致文化失调^⑦，或使社会文化失去均衡^⑧，而引起变迁。在这种社会或文化从稳定（stability）到变迁（change），或从变迁又趋于稳定的过程中，价值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价值本身在稳定与变迁之间所做的各种调适（readjustment）的工作。

中国社会具有悠久历史的大传统，其价值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变迁和稳定，虽说汉以后是一种儒家思想独霸的局面，这种情形还是不能避免，只是在程度上有些差异。以下我们就七种价值作扼要的讨论。

一、认知的价值

认知(recognition)是个人或群体于事物和人际关系所持的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早期表现于对天及自然的观念上，对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上，人的行为必须认同这些规范才为社会所承认。这时候，贵族是一群，平民是另一群。平民，由于没有获得

知识的权力，也许只能在世俗的事务上做若干选择。战国后期，知识已经开放到民间，有的布衣做了宰相，对于政治的态度和评价便有些转变；同时，儒家思想表现在对天、人关系及社会政治制度上的混乱，也使平民得到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杨、墨、道、儒虽然在知识阶层中散布得较广，也能说对一般人民毫无影响。不过，由于早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知识分子和平民间的认识距离相当大，知识分子在讨论宇宙观、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平民却只能在减赋、减兵役和劳役等方面来评价皇帝的好坏。统治阶层塑造一些权威，如官吏的独裁、宗法制度、地方主义等，平民便跟着这个权威生活，很少受到挑战。即使表现在宗教上，一般人也是把供奉“天地君亲师”视为当然。事实上，这种神牌是知识分子替统治者塑造的。早期的中国农业社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他们忙于自己的生存，忙于供养统治阶层，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时间去从事智力活动，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推论，只是盼望过一点平静的生活。虽然没有经过授权，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往往代表老百姓说话，把天命和民命经常搞在一起，这就变成一种传统。

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的大传统尚未建立，人民认知上的选择性（alternative）还比较大、比较自由，杨、墨、道、儒、法，以及一些别的思想法则，都可能作为个人的意识形态。比如说相信老子的小国寡民、绝仁弃圣，或荀卿的天道自然，都可以。到汉以后就不行了。西汉是大家致力于建构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把皇帝捧到天上，忠与孝成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东汉是一窝蜂迷信符瑞；王充与曹操没有机会，也不够力量把儒家传统截断；钟嵘的美学也不过昙花一现；终于，佛经加上韩愈的“文以载道”观念，使儒家大传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受到西方文化挑战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认知层次上已经产

生某种程度的转变，特别是对于科学与民主的了解，但对于伦理价值仍持保留态度，由于知识阶层，也由于统治阶层的，倡导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是偏向的作业，即鄙视工艺知识而尊重政治权威，把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科学与民主打进了这个传统的堡垒后，为了适应，人民不得不作若干新的选择，于是迫使原来的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发展，成就最大的是表现于近二十年来台湾的经济成长。部分传统，特别是伦理价值传统虽然还保留着，可是，新的宗教，新的技术，新的政治观念，新的社会制度均给予一般人以新的认知方向，这种冲击是很大的。

二、经济的价值

经济的价值 (economic values) 可以从人民的经济行为及对经济的态度表现出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具有农业社会的古老传统，这种传统表现在行为与态度上的，如：缺少成就动机^①，接受命运的安排，辛勤、节约而安于贫困^②，对人生的消极，行动谨慎，等等。这可以说是一种农民性格。中国人除了绝大多数为农民（城市工人或小市民也具有相同性格）外，还有一部分是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早期社会化中虽然也受了农民性格的影响，但对于经济价值仍表现了若干不同的倾向。最大的大同特征是他们在发号施令，企图变化原有的“匮乏经济”的情况。比如，他们往往用行政命令来保障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③，以及强调“耕读传家”的美德等。但实际效果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只是“重视农业”，而不是“重视农民”^④。诚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⑤。当时并没有一套可行的办法来增加农民的

收入及加强农民的成就动机，也没有机会让农民在社会事务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在重重的剥削与打击之下，农民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精神生活也是贫乏的，于是养成一种知足、安贫、认命的价值取向，如“知足常乐，终身不辱”，“贫穷自在，富贵多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④。这种谚语所代表的经济价值取向在农村里非常流行，并且成为农村青年社会化过程之一。表面上显得对富贵漠不关心，实际是因为争取不到而产生的退缩心理。农村在这种“匮乏经济”的情况下，生活环境非常恶劣：随时有可能得不到自己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资，控制不了疾病和水旱天灾，更抵挡不住各种各样的税捐及地主所制造的压力。

有几个时期，如战国、汉初、宋、明时代，中国很有会走上工业化的路，却终于都被重农派的势力压抑下去了^⑤。重农的结果是，工商业所能代表的经济价值无法形成，使土地在人民的心目中变得无比重要。于是，国家的财富用土地衡量，族产、公产用土地衡量，个人财富也是用土地衡量，土地几乎变成一种计算财富的唯一标准。本来只是农民附着于土地，重农的结果，使个人、家族、社团、政府都依附于土地。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农村经济一旦破产的话，整个国家经济也就等于破产了。

与经济价值有关而不为中国人所重视的另外两个问题是技术改进与资本累积。通常，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总把改良技术或发明新的技术看作“雕虫小技”，不值得去费心。绝大多数改革派所注意的是土地的重新分配或税捐力役的减轻，而非促进技术革新，也即是没有强调技术的经济价值。政府重视农业，而农耕技术两千多年来一直停留在原始的阶段，不求改进。这种农业经济，再加上宗法社会制度，人民即使偶尔有一点积蓄，也多半转

投资于收买可靠土地，或是花在教育费上。无论官吏、商人、地主、农民，有了多余的钱就是买土地。土地固然可靠，不需冒任何风险，可是，等到土地吸收了一切的游资，人民就没有更多的余钱去作其他事业的投资了，间接也就影响到技术改良与经济发展。

这种经济观念在农村中改变得非常慢，中国近代史上几次大的工业运动，对知识分子、官吏和城市商人产生特别的冲击力，农民则还是在往日的经济价值取向生活。真正对农民的经济观念产生影响的是二十多年来台湾的建设，指标之一可以从农村人口降低到大约38%看得出来^⑩；农民已经跳出了农产品自给自足的阶段，而把它当作可供交换的商品，并且是有计划的生产；农民已比较积极、进取，特别是农产品加工的转投资，刺激了它本身的发展。农产品输出，新技术的引用，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经济结构的改变，每一种都可能迫使农民对经济价值作重新的估计。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政策之下，政府和知识阶层也确定了重工商业的基本决策。我们对于经济的看法已不再是保护某一行业，而是增加国民所得及整体的经济发展。

三、政治的价值

西方政治思想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一直承认君主专制为合理的统治方式，并且习惯了，很少有人去怀疑它。从政治价值（political values）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为社会所公认的正当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制度的权力结构是权威式的，下层阶级服从上层阶级，皇帝可以任意指使他的官吏或人民，一般人只是听命而已。除了知识分子，除了意外的动乱，中国老百姓一向不大过问政治，所谓“天高皇帝远”，不完全表示对政府的漠视态

度，事实上想管也管不着，大多数人民终生难得见到县太爷一面，政府从不管或不问老百姓需要些什么，即有时要问，也是透过地方上的士绅阶层。人民没有任何正常途径去认识政府或认同他的国家，而一般官吏又多是狐假虎威，欺压善良老百姓，所以难免不对官吏存有几分厌恶感，“为人不做官，做官皆一般”。

在老百姓眼里，官吏的确有些讨厌，因为究竟“清官”太少。但反过来，做了官却有许多好处，比如，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情况，甚至发财；替家族和祖先争光……。老百姓对这些事看得十分清楚，有机会就要往这上面爬。本来，中国的官吏是世袭的，可是自从春秋战国把维持封建政治的宗法制度破坏以后，农民子弟也渐渐攀上了统治者的阶梯，所谓“布衣而为卿相”，就是当时的口碑。打入仕途有几种可能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寻求功名。第一步，努力使自己由贫农成为富农或地主；第二步，送子弟读书，十年寒窗，或使子弟变成一个出名的孝子；第三步，经由选举或考试跻身士绅集团；第四步，学而优则仕，成为地方或中央官吏；最后，第五步，利用机会为皇帝的代理人，即宰相之类的人物。这是农民往上爬升到统治集团的典型模式。一旦成功，权威地位也就稳固了，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从治于人变成治人，许多好处都源源而来。也可以说，由于这种道理，迫使每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不得不努力去寻找仕途上的显赫功名。第二个办法是买官爵。买官并非正途，也不太为人所尊重，但必要时还是可以充充场面。不少皇帝在财政困难时能够抛售，就由于好之者多。做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富有不能代表一切，有钱而无势，正如一个人少了一条腿，无法站起来。第三个办法是打天下。历史上的名言：“彼可取而代之”，表现得野心勃勃，不给就自己动手。不过，这种事多少要冒点危险，愿意去尝试的人不多。比较起来，还是采用第一个办法的人较多也较安全

可靠。

不管用什么方法获得了政治地位或取得权力，他们对于政治的动机与评价总是脱离不了权威、治人、民牧等一些观念。以儒家为例，主要的政治思想在于“仁政”，“为政以德”，天下就太平了；至于“礼治”或“法治”，那是手段的不同，本质上还是强调用一批人去“治”另外一批人。实际上以孔孟为代表所高喊的仁政，除了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只是一种理想。一般老百姓对这种政治理想莫测高深，他们只要能够不打仗，少纳点税，就算是碰着个好皇帝了。

清末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一大转变，但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统治阶层及一般人并未接受。五四时代把“民主”观念介绍进来，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个挑战把中国的政治结构作了一次彻底的改革，政治价值也改变了，最大的改变就是一步一步迈向福利国家的远景，一般人也觉醒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

四、社会的价值

传统中国社会阶层的理想型态是士农工商，皇帝与皇室是超阶层的，甚至官吏也是超阶层的，因为四个阶层中没有提到“仕”。如果以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标准分类，实际应该调整为下面几个阶层：

第一级，皇帝及皇室；

第二级，官吏，包括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

第三级，士绅；

第四级，商人；

第五级，农民及工人。当时城、乡分化不大，一般城市市民

也属于这一阶层。

这种分类是以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当时的商人虽被政府贬抑，但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比农人高，所谓“工不如农，农不如商”，这个现象一直存在于传统中国社会；商人并不完全满足于已有的身分，通常还透过买官捐监的办法来提高社会地位；士绅除了努力向上爬外，有官爵的也比无官爵的要显赫得多；皇帝最高也最安稳，除非发生暴乱或篡夺，他永远是第一级^⑦。

这种社会价值标准一直存在于传统中国社会，所以农人盼望发财，盼望他的子弟成为士绅，士绅再成为官吏，官愈大愈好。正如俗语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一旦成为“读书人”，不但进可以做官，退亦可以在农村中身价百倍。传统中国社会流行一种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即金钱、美人、官禄，全可以从仕途上获，难怪要把所有有志气的青年都逼上“功名”之路。这个现象一部分还反映在今天的大专联考和留学上面。

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宗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也即是两个大团体，同族与同乡。个人扮演的特殊角色不是从个人，而是从团体、同族或同乡的社会价值上表现出来，这种价值也延伸到死后和死去的祖先。所以一个读书人中了进士（或同类事件），匾额是挂在祠堂里；做了官，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拜祖先和拜见地方父老。所谓“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其实都是表现一种集团价值取向，个人只是在集团中分享他自己的成就。

自孔子以来，中国人在讨论社会关系时相当程度地强调仁爱，忠恕一类的行为规范，谋求建立一种和谐的理想社会。不幸这种理想并未成功，不但国与国之间经常征战，族与族之间也常械斗不已，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真是少得可怜。许多人把这种责任推到皇帝和政治家身上，我以为这是价值冲突，特别是

社会价值冲突的结果。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集团取向，仁、爱一类的行为准则是在集团内建立起来的，很难实行于集团外。比如“推己及人”，只能视为一种理想，在陌生社会就不容易发挥它的功能。这就等于说，要用特殊性的行为准则或价值取向去推行一种普遍性的理想，当然注定失败。因此，中国历史上尽管出了不少的忠臣、义士、孝子、隐士、豪侠和圣贤，而始终无法建立一个理想的和平国家。

自从西方的学校制度和自由、民主输入中国以后，形式上变了很多，比如考试、用人的方法变了，政治制度变了，权威态度变了，社会、人际关系也变了，但是，只能说某种程度或有限度的改变，而非彻底的所谓“脱胎换骨”。这样，除价值冲突外，我们又面临到另一个困境，即，如何使若干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去适应现代的社会环境？不过，很明显，这种适应方式成功的可能性极少；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改变我们既有的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中取得调适，因为像民主、平等、现代化这一类的社会价值已经是一个世界性潮流，谁都无法阻止。

五、宗教的价值

宗教价值 (religious values) 可以从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中表达出。孔夫子虽然主张人死了要“葬之以礼”，对祖先崇拜继承了殷周的遗风，却是不大喜欢讨论“怪力乱神”，表现了奉祀神的选择性。这种态度对后来中国人的影响很大。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祖先崇拜；二是多神崇拜。

祖先崇拜不只表示尊敬祖先和请求保护，也表示家族中内聚力和“慎终追远”的孝思^⑧。在一个同姓的村落中，你多半曾看